



“八一”起义

魏宏运编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八 一”起 义

魏 宏 运 編 著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7年•武漢

“八一”起 义
魏宏运編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漢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公私合營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

787×1092 $\frac{1}{32}$ 開·1 $\frac{1}{16}$ 印張·21,000字

1957年7月第 1 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統一書號：11106·37

定 價：（7）0.12元

目 录

一	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	1
二	“八一”南昌起义.....	8
三	进取广东.....	17
四	会师井冈山.....	26

一 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

担负着解放人类的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向压迫者、剥削者进行斗争，其所采取的斗争方式，由于各国历史、政治、社会具体条件的不同，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在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革命的主要形式，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呢？因为那时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人民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的统治和剥削，没有任何民主和自由，无法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时说：“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充分地告诉了我们中国当时的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道路的道理。

●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06页。

要进行武装斗争，那就必须组织军队，沒有一支忠实于人民事业的武装力量，是不可能进行武装革命的。可是要建立一支武装的军队，是很困难的：第一，因为军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反动统治阶级的军队，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很难使它变成人民进行革命的武器。第二，在反动阶级的统治下，人民是没有条件来自行建军的。在历史上，人民除了起义和割据而拥有武力外，统治阶级从来也不会允许它的敌对阶级拥有军队。第三，在革命风暴到来时，有了建军的可能，但如果领导者对于组织军队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建军也不可能实现。

回忆一下中国共产党建军的历史，就知道我国革命曾经经历了一段如何困难和痛苦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建立的。在最初几年，党还没有认识到掌握军队的重要意义，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没有给党以组织军队的机会。从1924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在接受了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帮助下，确定了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共产党就协同国民党，建立起广东革命政权，并且共同建立了为保卫政权和进行革命战争的武装力量。从那以后，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党才认识到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以及怎样组织军队。

在广东革命政权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军队都掌握在军阀的手中，每个军阀都有自己的军队，每一支军队都有自己的地盘，而革命政府并没有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后来在苏联帮助下，于1924年5月，成立了黄埔军官学校，训练革命骨干，并且着手改造军阀的雇佣兵，建立国民革命军。共产党为了协同

当时的国民党进行这个工作，就把自己优秀的干部，派到各种军事工作岗位上。周恩来同志被派到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同志到军校担任教授部主任，恽代英、聶荣臻等同志担任教官。共产党员在军校中虽然是少数，但他们都担任了领导的职务。到了同年的冬天，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立了，以叶挺同志为团长。这个团内连以上的干部，大半都是共产党员。由于共产党员在军校和军队中积极进行思想和组织工作，又加上在工人中组织工人纠察队，在农民中组织自卫军，这就给革命建立了坚强的战斗力量。就是依靠了这些力量，1924年10月，广东政府削平了商团叛变；1925年，发动了两次东征战争；1925年6月，消灭了阴谋颠覆革命政权的滇、桂军阀部分武装，到1926年春，就把广东全省置于革命政权控制之下，使广东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据地。南方各省的军阀，看到革命声势壮大，相继把自己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旧日的粤、桂、湘、滇、鄂等地方性的军队番号，一律取消，改编为6个军。各军都仿照苏联军队制度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因此许多旧军队就改变了从前不好的旧作风，变成了一支革命的队伍。这时共产党员周恩来在第一军、李富春在第二军、林伯渠在第六军、黄日葵在第七军、李之龙在海军局都担任了极为重要的职务。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便誓师北伐了。

北伐受到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欢迎和赞助。在全国人民革命热情高潮中，北伐军向北直扫。各地共产党员，积极组织群众参加革命，给北伐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927年春，北伐

軍解放了从广州到长江两岸的广大地区。广东革命政府在这种优势下，就由广州迁往武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受到了根本的动搖。

經過了战争的鍛炼和考驗，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极大的威望，在軍隊中也居于政治领导地位，并且也学到了組織軍隊和組織战争的学問。毛澤东同志論述党在这一时期对軍隊問題的認識說：

“我們党虽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1924年至1927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認識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黃埔軍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了。經過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軍隊。”●

正在革命运动生气勃勃地进行，党的力量不断增长和扩大的时候，潜伏在革命陣营中的、以蔣介石为首的一撮民族敗类，暗中策划了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在1926年3月20日，他們制造了中山艦事件，派兵占領了中山艦和别的軍艦，逮捕了中山艦艦长李之龙同志，还拘押了黃埔軍校、国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包圍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顧問住宅。后来，蔣介石又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軍，篡夺了革命的軍权。这时，毛澤东和其他一部分同志，主張給敌人以反击。但是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

● “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11—512頁。

走上了右傾机会主义的道路。他害怕这样做会引起統一战綫的破裂，于是就主張退讓。这样，蔣介石就更大胆了。接着，在1926年5月，蔣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又提出了“整理党务案”，限制和監視共产党的活动，力图削弱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蔣介石叛变革命的这些罪恶行为，都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傾机会主义所容忍了。而蔣介石在向革命作了这两次襲击后，又繼續伪装革命，以逐步地实现他的阴谋。这就給后来的革命潜伏下了危机。

1927年春，当北伐軍打到长江流域的南京、上海时，这批伪装革命的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及封建买办势力拉上了关系，因为他們都害怕革命运动，于是狼狽为奸，向革命发动总进攻。以蔣介石为首的反动分子，从此就完全揭开了伪装的面目，公开叛变了革命。党在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沒有任何准备，革命处在危机中。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局势就发展成为这样：在武汉革命政府和革命軍队以外，出現了反革命的政权和軍队，和武汉革命政府形成对峙形势。武汉是革命的中心，革命政府在政治方面居绝对优势；在軍队及地盘方面，虽然沒有反动政权拥有的多，但战斗力强，农民已組織起来。如果当时党能立即改善武汉政府的軍队，使軍队更加革命化，同时再号召工人、农民拿起枪来，就可以組成一支可靠的軍队，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那么武汉政府就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軍事上也会处于优势了，还在1926年3月，毛澤东同志就明

●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9—240頁。

确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认为应该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革命政权。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完整地反映了农民的革命风暴，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问题。同时当时广大工农群众对于蒋介石的叛变深为痛恨，而且有的已经行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党发出号召，就可以把群众运动的强大力量统一起来，成立巨大的正规军。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吓倒了，要党向敌人投降。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武装叛变，屠杀工农群众，破坏革命组织。英勇的共产党员，组织了长沙附近各县农民十余万人，围攻长沙。这时陈独秀怕“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宣布取消进攻长沙的命令；党的可靠战斗力量——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劳动童子团，也被解散了。不仅如此，陈独秀还要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退出军队，并命令陈赓同志，把由党所组成的一个特务营，交给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党已组成的武装力量，就这样地受到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打击，被瓦解和破坏。原来武汉国民党早就害怕工农群众运动，再加上又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威胁，就由动摇走向叛变，在7月15日，也宣布反共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此归于失败，黑暗又笼罩了全国。

国内外反动派以为：中国共产党从此就已经被消灭了，工农革命运动不会再起来了，他们可以安然地享受从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手中窃取来的革命果实了。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永远熄灭不了的。

在革命失败、黑暗势力高涨的年月里，有少数意志不坚

定、貪生怕死的分子，脫離了黨，脫離了革命，有的還投靠了敵人。革命已處於危險的關頭。但是工人階級和它的政黨，卻沒有妥協，他們變得更加堅強，人民的革命意志不僅沒有因此而減低，反而更為增長。這次革命的失敗，使黨和人民受到很大的教育，如果說在過去幾年中，黨還沒有認識到組織軍隊、準備戰爭的重大意義，那麼在經過了幾年戰爭和遭受到敵人幾次襲擊後，黨已充分地懂得掌握武裝的巨大意義了。毛澤東同志武裝鬥爭的思想，從此以後就成為中國革命的指針和方向。1927年8月1日，黨第一次獨立地拿起了武器，舉行了南昌起義。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於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這個時期是我們黨徹底地認識軍隊的重要性的極端緊要的時期。”[●]

●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12頁。

二 “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上半年，中国的革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革命运动象野火燎原一样，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吳佩孚、孙傳芳、張作霖等軍閥的武力，眼看就要全部被摧毁。但是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突然于4月12日叛变革命，实行白色恐怖，共产党成了非法組織。武汉革命政府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抗击北方的旧軍閥，还要抵御蒋介石这个新軍閥。在这革命危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評了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路綫；大会中还討論了农民的土地問題以及对武汉国民党的策略等問題，但是沒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党还是在陈独秀操縱之下。陈独秀依然采取了右傾机会主义的路綫，对武汉国民党抱着妥协态度，对农民的土地革命采取了阻止的办法。那时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正在高漲，特别是湖南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給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但是这个运动，却吓坏了武汉上层分子，大喊农民运动“过火”。陈独秀跟着武汉国民党跑，也認為农民运动“过火”，这就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气焰。5月20日，一部分反革命軍队占据了益阳县工会和农民协会，解除了农民自卫軍和工人糾察队的武装。5月21日，許克祥的队伍在长沙圍攻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

部及妇女、青年等革命机关团体，捕杀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5月29日，唐生智也宣布反共。6月初，江西也开始了驱逐共产党的活动。6月中旬，反动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在郑州和徐州召开了专意对付共产党的会议。7月15日，武汉国民党正式宣布反共，决定与共产党分裂，实行捕共、杀共的白色恐怖，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狂妄口号。当时，武汉大智门，济生三马路，裕华纱厂门前的桥下，一纱厂一马路、四马路，汉口合记蛋厂等处，一次就被反动派杀了60多人。武汉变成了一个杀人场，不少的共产党员英勇地牺牲了。这样，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完全失败了。在这紧急关头，党推定周恩来、张太雷等5人，组成临时政治局，筹划召集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筹划在农民运动有基础的湘、鄂、赣、粤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并且决定在江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南昌，举行起义。周恩来同志被任命为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

从七·一五以后，人民要公开谈论政治已不可能了，但工人农民、城市贫民，还是继续革命，在个别地区，甚至发展成为局部武装斗争。在武汉，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如恽代英、澎湃、吴玉章、林伯渠、刘伯承、聶荣臻等，先后离开武汉到九江、南昌去。同时，在党领导下和影响下的军队，也奉命向南昌集中。

武汉政府这时总共有五、六个军的正规部队，其中，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占着相当比重。他们分布在南昌、九江、武汉一带。

在南昌的軍官教育团是朱德同志领导的。这个团是1926年11月北伐軍占領南昌后，朱德同志来到这里創办的。學員多半是江西的革命青年和在战争中俘虏过来的滇軍軍官。

在九江的第一一軍第二四师，是叶挺同志率领的。叶挺同志本来是北伐时有名的第四軍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特别是在汀泗桥战役和咸宁战役中，击潰了吳佩孚的主力軍，給第四軍赢得了鉄軍的称号。北伐軍占領南昌后，叶挺同志就被提升为第二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蔣介石叛变后，这个师奉命东下討蔣。

原来属于叶挺同志率领的独立团，这时驻扎在南潯鉄路綫上，由周士第同志领导，番号是第四軍第二五师第七三团。

在鄂东武穴和九江一带驻扎的第二〇軍，是賀龙同志率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不同于旧軍閥的湖南地方軍隊。在北伐軍进入湖南后，这支队伍受到了革命的熏染和党的教育，就左傾起来，成为革命战斗中的一支主力。这支軍隊和第四軍、第一一軍，同被公認為北伐軍中最精銳的部队。

在武汉的是国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警卫团，由卢德明同志领导。

这些武装力量的确是一支雄厚的力量，但是因当时处于分散状态，不仅沒有在党的統一领导之下，其中大部分还在敌人的控制下面。因此党必須秘密地命令部队摆脱敌人的控制，予以集中，并要爭取左傾的第二〇軍参加革命。

正当我軍奉到党的命令开始行动时，反动派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布置了一个圈套，要叶挺、賀龙同志到廬山去

开会，企图趁开会期間，解除叶、賀兵权。情况很危急，为了应付这种严重局面，叶挺、叶劍英、賀龙等三人，在鄱阳湖的小舟里，开了个紧急會議，他們决定不去廬山开会，并且决定把队伍开到南昌去。賀龙同志这时虽然还不是个共产党员，但他毅然地参加了这一偉大行动。

叶、賀軍隊一批一批的沿着南潯鉄路綫，从九江向南昌开去。叶挺同志的部队走在前面，賀龙同志率部尾随其后。那时南潯鉄路遭到破坏，不能运输。群众为了迎接叶、賀軍隊，积极搶修路綫。7月26日，部队开近南昌。这时通往南昌的大桥，突然被反动派破坏。党于是动员了南昌市的鉄路、鋸木工人百余人，連夜搶修，保证了部队的前进。7月27日，叶挺、賀龙和在南昌的朱德所部，胜利地会师了。南昌市民張灯結彩，張貼标語，組織了运输队、招待站；工人組織了糾察队，欢迎叶、賀軍的到来。革命的声势，立即在南昌高漲起来。

我軍会师后，便在党的統一领导下，根据敌人的分布情况，选择有利于起义的据点，分別駐扎下来。駐防在南昌的敌人，有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等六个团的兵力，因为我軍还没有举起起义的旗帜，敌人对我軍軍事上的急剧变化，沒有感觉到有什么威胁。那时賀龙同志的司令部，設在朱培德第三軍司令部的对面子固路的圣公会內。叶挺同志的司令部，設在原府学前街江西大旅社內（即現在的江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此处是全市的制高点，因此起义軍的总指揮部設在这里。朱德同志所部，仍然駐在軍官教育团所在的江西講武堂內，附近駐扎有敌人的一个团。

我軍向南昌的集中和駐扎，一點也沒有暴露出就要起義的行動。起義準備工作是非常秘密地進行着。就是將要參加起義的部隊，也不知道他們來到南昌就是為了馬上舉行起義，他們就是馬上舉行起義的人。

那是7月28日，周恩來同志把起義的事情告訴了賀龍同志。賀龍同志堅決表示：“我完全聽從共產黨的命令，要我怎樣干就怎樣干。”^①就在這一天，劉伯承同志協助賀龍同志草擬了起義的計劃。起義的總指揮部同時成立起來，葉挺同志擔任總指揮。

7月29日，配合起義的行動開始了。李立三同志和被黨派去擔任第二〇軍第三師第六團團長的陳賡同志，在市內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並于當天晚上，解決了國民黨江西省銀行，把行長扣押起來^②。

7月30日下午，賀龍同志召集了團以上的幹部，向他們簡短而堅定地宣布關於起義的事情。他說明了為什麼要舉行起義，以及應該遵守的紀律。他說：

一、國民黨已經叛變了革命，國民黨已經死了。我們今天要重新樹立革命的旗幟，反對國民黨，反對反動的政府，打倒蔣介石。

二、我們大家都是在一塊很久的。我今天起義了，愿跟我走的，我們一塊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離開部隊。

三、我們今后要聽從共產黨的領導，絕對服從共產黨的命令。

① 轉引自王敏昭：“一切依靠黨和群眾”。“新華日報”，1951年8月7日。

② 見陳賡：“從南昌到汕頭”。“解放軍文藝”，1952年8月號，第20頁。

起义就要开始了。7月30日晚上，举行了一次部队紧急集合的演习，給8月1日的起义作好准备工作[●]。

就在这时，党内发生关于起义的激烈爭論。張国燾（后来成为叛徒）反对起义，要求党取消起义的計劃。党知道很清楚，如果接受了張国燾的意見，革命就会处于非常危险的境遇中。党毅然拒絕了这种有害的意見。

这时我軍集中南昌，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没有办法，但是还想来控制我軍。从7月29日起，汪精卫、孙科、朱培德等在廬山开了3天会，議决要叶挺、賀龙把軍队撤回九江；并下令通緝譚代英、廖乾吾等同志。但是这也只不过是个決議罢了。叶、賀軍队已是共产党领导的軍队，它不再受革命叛徒的指揮了。当时在南昌，已不是国民党逮捕共产党，而是共产党要逮捕国民党反动派了。

7月31日夜晩，起义軍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周密地部署了兵力。午夜，当起义的信号从城墙上打响的时候，起义軍立即投入战斗。賀龙同志所部，进攻江西省政府及朱培德第三軍司令部；叶挺同志所部，进攻敌第三軍；朱德同志所部，在貢院的皇殿側和敌人的一个团接火。起义軍很快地将敌人包围。这时敌人的士兵还在梦中，軍官在窑子里鬼混或在賭博，他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結果整团整营整連的敌人，都成了起义軍的俘虏。战斗最为激烈的是朱培德第三軍司令部，敌人在进行了三、四个小时頑抗后，終被起义軍消灭了。到8月1日的黎明，南昌城已整个是起义軍的了。第

● 見王敏昭：“一切依靠党和群众”。“新华日报”，1951年8月7日。